

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研究丛书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编

中国共产党

领导方式的改进与创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PDG

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 改进与创新

黄跃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改进与创新/黄跃民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208-04363-9

I.中... II.黄... III.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
方法—研究 IV.D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427 号

责任编辑 王晓华
封面装帧 邹纪华

·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改进与创新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编

黄跃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116,000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363-9/D·750

定价 15.00 元

用“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统领重大理论 和实际问题研究 (代序一)

王仲伟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丛书》(6种)即将出版,这是上海理论界为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献出的一份厚礼,也是近一年来,上海理论工作者认真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从现在起到十六大召开,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要组织力量进一步加紧研究”的指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潜心研究,集体攻关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弘扬“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这个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

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他曾语重心长地说,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以后的路怎样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关注世情、国情和党情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与时俱进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是党的全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判断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用“三个代表”统领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必须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2002年“5·31”讲话中特别又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是坚持与时俱进,并且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些论述,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更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时代性、开放性和进取性。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抓住这个关键,就不能自觉地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能科学地分析《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

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也不能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因此,也就很难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用“三个代表”统领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必须抓住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个核心。“5·31”讲话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怎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呢?这是必须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党的先进性与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的关系,党的先进性与时代潮流的关系,党的先进性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的关系,党的先进性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关系,党的先进性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关系,等等。紧紧抓住这个核心问题来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用“三个代表”统领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必须抓住执政为民这个本质。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只有抓住这个本质去研究,才能始

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用“三个代表”统领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必须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离不开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较量中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发展。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只有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研究,才能不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我感到,这套“丛书”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抓住了关系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思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实践的发展,有些问题会以新的面貌出现,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还会不断涌现,我们理论工作者只有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大胆探索,敢于创新,超越前人,超越自我,才能不断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研究当前重大理论问题的态度是什么

(代序二)

郝铁川

所谓“重大理论问题”，就是指举国上下普遍关注、涉及党和国家兴衰荣辱与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理论问题，而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因此，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必须注重“经世致用”，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特别是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自觉性不可或缺。绝不能书生意气，百无一用。更不能矫情造作，孤芳自赏。

怎样研究“三个代表”？关键是我们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提出一系列让人民群众可以看到和可以享用到“三个代表”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的具体举措，杜绝在党内形成任何形式的既得利益集团，真正做到执政兴国、执政为民。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就是因为在当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二十几个属于发达行列，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 49 个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表明资本主义不是解除人类贫困、痛苦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先进的人们需要它；毛泽东思想推不翻，就是因为它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邓小

平理论忘不了,就是因为它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显而易见,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的最大任务,就是要让“三个代表”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真真切切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

怎样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关键是我们着眼于解决异常紧迫的社会就业问题,为人民投资受益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撑。据初步匡算,我国三分之一农村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现有农村富余劳动力总计 1.5 亿人左右;每年全国新增劳动力 1 500 万左右;有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国有企业中扣除下岗的职工还有 30%—50% 的富余人员;而 2001 年全国平均每天有 4 000 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就业渠道。这些事实充分表明:鼓励民间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已刻不容缓。就业生存第一,这是当前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不容回避的出发点。当年马克思之所以从财富创造过程中抽象出价值创造过程,旨在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而我们今天的任务则旨在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劳动,更要关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怎样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关键是我们着眼于维护社会大团结,最广大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一支以建设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当年马克思强调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是为了唤起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我们当前分析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阶级、阶层间的合作,进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切不利于团结的话最好不要说,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事最

好不要做。我们要把党的十六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鼓劲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这就要求我们为全国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合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而献计献策。

怎样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关键是我们着眼于怎样更好地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学会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以加速发展自己,抢占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当前,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还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实力还不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策略,研究的是如何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方略。历史早已昭示,击败对手的通常办法,是将对手的长处学过来。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坚持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集战士和学者气质于一身,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一贯要求。因此,讲大局、讲团结、讲稳定,这就是我们研究当前重大理论问题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导 言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对那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领导方式,必须尽快改进和纠正。当前,研究如何实现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也是党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什么是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因此,可以说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现代化事业中的统帅和向导作用。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来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其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也就是用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其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思想领导,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教育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主要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来实现。党的组织领导,就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这三者之间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政治领导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

关于领导方式,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把握它的内涵。首先,与领导方法相比较,领导方式是领导方法的体系化。领导方法可以灵活多变,而领导方式则相对稳定和系统,是领导活动的模式化。

其次,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执政方式,系指执政的法定方式,即宪法和国家法律予以确认的方式,它是国家政党制度和国家执政制度。世界范围的政党执政方式,包括一党制模式、两党“轮流执政”模式、多党“联合轮流执政”模式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就是与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关联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是说,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或者说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模式),是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党的“执政方式”。这种执政方式,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两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和与此相联的政治协商制度。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也有别于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由此可见,执政方式与宪法相关联,属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范畴,是相对稳定的;党的执政方式,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逐步建构和完善起来的;按照宪法原则和“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执政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任务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或“转变”,也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继续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

相比之下,政党领导方式的内容更宽泛,不仅涉及到如何领导国家政权,还关系到如何领导包括各类经济、文化、社会等组织在内的基层社会的问题。从我们党的情况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时期,只存在领导人民群众斗争方式的问题,还谈不上严格的执政方式问题。而党执掌政权以后,党的身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领导就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方面是要执掌国家政权,要处理党和政权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还要领导经济、社会、文化等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处理党群关系问题。因此,党的领导方式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不仅指执掌国家政权的方式,还包括领导社会、经济、文化等组织和各社会阶层群众的方式,以及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对社会进行组织、动员、整合,实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体制化的手段形式和运作过程。

第三,党的领导方式是与领导体制密切相关的。领导体制是指一个政党与其赖以建立的阶级、阶层(或社会民众)之间、与

国家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权力源泉、权力范围的认定与划分的制度化的设计与规定。而政党领导方式就是指领导体制赖以运转的一切方法、手段和途径的总称。领导的时空条件不同决定了领导体制的不同,领导的体制不同又决定了领导方式会有明显的差异。

二

党的领导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我们党传统的领导方式,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党的领导方式作一历史性的回顾,有助于加深对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在领导人民开展建立和扩大红色政权的斗争过程中,一方面党在根据地政权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被确立下来;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以党代政的倾向。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的那样,“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①抗日战争时期,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各根据地由于长期被分割,分散主义、山头主义有所滋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党中央作出决定,强调了对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这种集中的领导体制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激烈多变的战争环境中,为了完成紧迫的任务,而产生的党包揽行政事务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这种领导方式是合适的。因为,当时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特点迫切要求革命党解决这样的历史性课题,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明进步的新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采取了特定的领导方式,适应了在特殊的战争环境里夺取政权的需要。这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党”的领导方式。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取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甚至不适应党执政的需要。如何执政已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党对此问题也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得不很理想,突出表现在: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方式理应按照执政规律进行转变,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原因,基本上延续了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中存在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现象,就其历史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是集中的领导体制基本确立时期,同时产生了以党代政的倾向。1953年,在全国开展了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从组织上在党内设立工交、财贸、文教等与政府行政机构对口的部委,加强了对政府各级行政工作的直接

干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觉察到了这种做法的某些不妥。邓小平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对什么是党的正确领导作了阐明,要求全党注意改变党政不分的状况。第二个时期(1957—1959年)是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全面形成时期。在反右斗争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党动手,书记挂帅”的口号,并且确认“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同党政不分之间划上了等号。把政府的各部门划分为五大块,由中央成立的财经、政法、外交、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分兵把口,实行直接对口领导。省、市、县党委也相应设立政法、工交、财贸、农林、文教等部门直接对口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在基层企事业单位批判“一长制”,实行书记挂帅,开始推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这样从中央到基层完成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第三个时期(1960—1966年)是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完备与加强时期。一方面,在经济困难面前,为了适应经济的调整,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实行机构精简,干部下放;另一方面,针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把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全面纳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轨道,促使党的领导体制更加集中,在再一次反对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的口号下,收回下放给地方的权力,造成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在地方要“大鸣大放”的口号下,使党的机构趋于行政化、国家机构趋于军事化。第四个时期(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我们党的集中领导体制发展到极不正常的时期。一切党、政、军大权集中到“中央文革小组”,各级党政组织处于瘫痪。“四人帮”则乘机大搞法西斯专政,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由此可见,由于历史原因,传统的党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党的模式。

三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党的领导方式面临进一步改进的要求。从迅速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世情”来看,高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并不断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国际政治领域,“冷战”时代虽然结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模式并没有消失,在全球到处推行它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国情”来看,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从“党情”来看,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新形势要求党进一步转变和改进领导方式。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方式如果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总之,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党到了需要变革领导方式的新的历史阶段。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这就要求,在推进党的领导方式改进过程中,坚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是关系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命题。作为党的执政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能是一